

面白崇禧又经常在作战会议中指桑骂槐地说：“他妈的，我当总司令，连一枝枪一块钱的批准权也没有。”前方部队长更因战况失利，希图委卸责任，不断电告蒋介石和白崇禧说：“弹尽粮竭，无法应战。”我处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地，终日提心吊胆，总望待机离去，免受灾难。

白崇禧对补给区职掌的重要是很了然的，因此他总想把补给区抓到手里。在第九补给区成立时，白即保荐许高阳为第九补给区额外副司令，以便伺机取代我的职务（许在抗战时曾随李宗仁在第五战区当过兵站总监），只因我不好处置，才迟迟没有下手。一九四八年底，白崇禧曾一度与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密商，向当时国防部保我担任某绥靖区司令官，事为郭忏阻止，没有实现。

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我参加华中“剿总”的作战会议，白崇禧亲自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华中政务委员会主任李品仙、华中地区空军司令罗机、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总部参谋长徐祖诒以及华中“剿总”高级幕僚十余人。会议中有人指责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笃伦老奸巨滑，作事敷衍，不能配合军事要求。白崇禧听后即贸然指着我说：“朱司令，你去当湖北省政府主席！”我听了这句话，认为是开玩笑的，没有作答。会议进行不久，白崇禧又提出要我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我才看出他的话是认真的，同时我也理解到他是要用这个手段来攫取补给区。我立即表示：

“我不愿做补给区司令，更不愿当地方行政官，如总司令有意栽培我，请给我带兵作战的机会。”白说：“带兵的机会很多，以后再讲。”接着陈明仁对我说：“我拥护你当湖北省政府主席。”我答复陈明仁说：“如果你当湖南省主席，我就当湖北省主席。”白又接着说：“程颂公（程潜）资格老，我不好办。”谈到这里，我未作肯定答复，又继续进行作战会议。会议结束后，白崇禧送我出门，又对我叮咛说：“我刚才讲的话是真

实的，你考虑一下，限三天答复。”

这天晚上，我彻夜没有入睡，想到我是带兵作战的人，哪里懂得什么省政，我所认识的朋友都是军人，从哪里去找地方行政人员。我当了补给区司令，还没有脱离军事范围，有机会还可以回到部队中去，如果做了湖北省政府主席，将来再做什么呢？但补给区也不是我久留之地，白崇禧既然要我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很明显的是要攫取补给区司令，安置他的亲信，而且他早已走了一着棋，把许高阳摆一额外副司令，我赖在那里有什么意思？而且将来还会有无穷的隐忧。反复思考，始终难得作出决断。第二天、第三天，我先后找到刘先云、朱怀冰等商量，把这个情况和我的思想活动告诉他们。他们也认为事出突然，但都主张我接受这个职务，并且鼓励我说：“别人想当省政府主席还想不到手，为什么要你当，你还不肯当呢？至于省政府人选问题，我们帮你物色。”尽管他们如此说法，我还是犹豫不决。过了两天半，白崇禧打来电话说：“快三天了，你考虑如何？”“我答复说：“请让我再考虑一下。”在白崇禧的催促和刘先云、朱怀冰等的怂恿下，我终于在第三天答复了白崇禧，表示接受，并向白请示改组湖北省政府的人事安排。白说：“这是你们的问题，不要请示我。我只有一句话提请你注意，所有委员、厅长，一榜及第，不要拖泥带水，免得中央派人来，以后不好办。”

此后，关于省政府的人事安排与物色，反复与刘先云、朱怀冰等研究。朱怀冰主张用老人，我主张出冷门，找新人。结果还是依照我的意见，决定、委员兼民政厅长彭旷高（彭曾担任过湖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委员兼财政厅长许季珂（原任湖北省邮政管理局长）、委员兼建设厅长陶述曾（朱怀冰介绍）、委员兼教育厅长王介庵（朱怀冰介绍）、委员兼秘书长刘先云（我的主张）委员兼保安副司令杨啸伊（原任）、委员余正东（原任）、李朗星、杨寿琼（李、杨均系白崇禧介绍）、朱怀冰（我

纪念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

——黄埔军官学校建校六十周年

黄埔军校建校前后的一段回忆

王逸常

今年六月十六日是母校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六十周年纪念日。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迎接这个伟大的节日。回忆六十年前在黄埔军校学习、工作的一段峥嵘岁月，革命历史还历历在目，使人难忘。

一九二四年春季，我还是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学生。校长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总务主任是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邓中夏。我所在的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和教授蔡和森等，都是共产党员。我接受共产党的指示，报考黄埔军校学军事。在上海初试录取，于四月赴广州复试。一九二四年五月四日到黄埔军校，受新兵训练。六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先生由孙夫人宋庆龄陪同登上阅兵台阅兵，孙总理对我们训话时说：中国的革命已经十三年了，民国的年号是有了，却没有民国的事实。俄国的革命比中国晚六年，但他们的革命是彻底成功了。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们组织了革命军队和反动势力作斗争。所以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能克服，在短时间取得胜利。孙总理接着说，现在成立黄埔军校的意义，就是要用黄埔军校的学生做根本创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去彻底完成中国革命。孙总理

• 1 •

在这次讲话中，明确的指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必要性。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在一九二四年秋天。那一天，我们中共黄埔直属支部成立，同时带领学生队中的共产党员，到设在东皋大道的广东农民协会，听广东革命政府顾问、第三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作报告。报告前，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招呼我们支部的工作人员到一间会客室里，张太雷、彭湃同志正围着一位同志说话。这位同志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英俊。我们一进去！他就迎上来亲切地与我们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叫周恩来”。陈延年书记接着告诉我们：“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同志到黄埔军校工作，他刚刚从法国回来。”我们随后知道，周恩来同志是经过廖仲恺、蒋介石和加仑将军商讨后，决定请中共推荐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的。周恩来同志到黄埔军校，以中共两广区委军委负责人的身份，改组中共黄埔直属支部为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分配我担任组织工作。

周恩来同志来到之前，军校政治部空有其名，只见蒋校长印一些曾（国藩）左（宗棠）《治兵语录》让大家学习。周恩来同志来了之后，军校气象焕然一新。他定期给官佐学生上政治课。上课前都要高唱校歌：“怒潮澎湃，红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他一再解释校训“亲爱精诚”，才能有力量，要执行孙总理的三大政策，才能使国民革命彻底成功。他要政治部宣传股杨其纲和洪剑雄编辑出版《士兵之友》壁报，用红蓝两色套版油印出来，分发到在校的学生队及教导团各队。那时，我的工作组织股员，专制统计表，统计全校官佐及学生的年龄、籍贯、学历、家庭出身等，掌握思想动态，进行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要我把每天各大报的重要新闻剪下来，分政治、经济、军事、国际要闻等栏，贴在簿子上，他每天都要看，并用红铅笔划重点，作为壁报材料，向官兵宣传。

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曾绘出一幅漫画很是生动，吸引了全校师生。画的是戴季陶身穿长袍，背着孙中山的塑象，从公园里往孔庙里背。这是讽刺戴季陶把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拉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妄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车轮，反对国民革命，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因为那时在军校已显露出一股倒行逆施的反潮流歪风，而戴季陶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舆论制造者。

一九二四年夏，孙中山大元帅统率湘、豫、粤各军，将大本营移节韶关，准备北伐。这时留在广州各种反动军队和各种反动势力，勾结起来向革命进攻，爆发了商团叛变的事件。就在这年夏秋之间，他们明目张胆要推翻孙中山的革命政权，阴谋建立商人政府；商团军的势力由广州市发展到南海、江门、佛山、花山各地，武装齐全，非常猖狂。到十月十日“双十节”前，广州盛传商团要在广州市实行武装叛变。十月十四日、十五日，广州革命委员会立刻组织了工农兵武装，军校一部分学生也参加了战斗，很快地平定了商团叛变。

记得我们第一期学生进校十多天的时候，廖仲恺党代表有一次演讲，他说：“中国目前最大的缺点，不是没有人材，实在是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要想挽救中国，只有三件事，就是要有统一的组织，统一的意志，统一的精神。这三件事须从国民党做起……”党代表诚恳的语调、仁慈的态度，现在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

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千方百计破坏国共两党的团结，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他们狠毒地对廖仲恺先生进行了暗杀。周恩来主任对这件事非常义愤，立刻在政治部奋笔疾书，写下了悼念文章。他指出：“这个暗杀是有其背景的，因为党代表的三个统一使帝国主义恐慌起来，国内的反动派深深仇视……我们党代表的热血为党为国为民众流尽了。我们要继承党代表的遗

志、遗训，实现三个统一的主张，完成国民革命，扫清帝国主义分子和一切反革命败类”。

一九二五年二月，周恩来同志亲自率领军校政治部部分人员参加第一次东征。政治部随军东征的人员有洪剑雄和我两人。革命军所到之处，都有农民送茶送水，放鞭炮欢迎，还为革命军做向导和报告敌情。作战时，他们举红旗，吹海螺助威，鸣枪助战，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军士气。所以东征军能以寡敌众，打垮淡水的顽抗之敌。

淡水城有一个外国传教士，到政治部宿营地采访。周恩来同志接见他时说：“我们不反对信仰宗教，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你们遵守革命秩序就行了。”他警告外国传教士不要搞间谍活动，不要做反宣传，不要欺压中国人民。他说话斩钉截铁的充满着革命的雄厚力量，外国传教士只得唯唯诺诺，垂头而去。

革命军从缴获的电文中，发现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互相勾结、准备在广州密谋叛乱的密电。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又消灭了杨、刘的叛乱，稳定了广州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总指挥是蒋介石校长。他邀请了俄国顾问及担任东征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制定攻惠州城的方案，由四面围攻改为三面围攻。周恩来同志又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打先锋，攻下了惠州城。最后，为第二次东征开辟了前进的道路，终于攻克了陈炯明、洪兆麟、杨虎等盘距多年的地盘，取得了彻底消灭敌军的全面胜利。

革命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些胜利，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一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就是两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结果”。

回忆这段革命历史，使我们清醒的看到，只要国共两党合

作，团结全国各民族，我们的革命就顺利地向前发展。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结果。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在进行四化建设，各方面都呈现欣欣向荣、民富国强的景象。但海峡两岸的同胞还不能团聚，国共两党还未进行第三次合作。我是多么希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在我有生之年见见黄埔军校的老同学、老朋友叙叙旧情。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新年茶话会上说得好：“对于台湾同大陆的关系，团结则安，分裂则危，谁再阻挠祖国的统一，谁就对不起先人，也对不起后人。”

（一九八四年五月）

作者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即跟随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股员，从东征、北伐，直到“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前，始终未离周恩来同志身边。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同志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时，他在三十六军政治部任少将副主任，后又调第一战区政治部（驻西安）任少将副主任。一九四二年，因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他即愤然离职。解放后，在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任馆员，现年八十七岁，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

黄埔一期“老大哥”韩濬访问记

方 知

今年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黄埔军官学校建校六十周年。虽然我是黄埔军校后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但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听到过许多黄埔时期的故事轶闻。

黄埔军校初创之时，有两名被全体同学称作“老大哥”的学生，一位是四川籍的曾扩情，一位就是现在武昌担任湖北省政协常委、文史专员的韩濬先生。

对韩濬先生，在抗战期间，我曾同他有过一段渊源：一九四三年，我在湖南芷江，和马立维同学（军校十五期毕业，现任台湾国民党台北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一同担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参谋长邱维达的机要侍从参谋；韩濬先生当时任四方面军所属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因而曾经多次见面。他是王耀武的下级，而他每次到司令部时，王耀武总要亲自迎送，礼遇备至。以后才知道，王耀武是三期学生，韩濬则是王的区队长，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

今年春节我去南京，我的叔岳父、原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现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江苏省政协常委）邱维达，曾嘱我代他去看望韩濬先生。因此我在纪念黄埔建校六十周年前夕，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到武昌紫阳路他的住所，见到了这位黄埔“老大哥”、现已九十二岁的老人。

见面时，我首先转达了邱维达老人对韩老的问候和敬意。他

显得非常高兴，连声“请坐”，让我坐在沙发上，与他面对面地促膝谈心，仍然是当年那样温和谦逊，平易近人。我仔细打量，他精神矍铄，目光炯炯，虽然听觉稍差，而谈锋很健，尤其记忆力强，头脑非常清新。

我们先是谈了一些关于一九四三年湘西会战中阻击日寇西侵的胜利经过，继而谈到黄埔军校的一些情景。

当韩老询知我在抗战时期投笔从戎，考入军校，由湖南远赴成都入学的经过后，联想起他当年投考黄埔一期和加入共产党的许多往事。韩老说，这些都是他在过去极少涉及的话题。

韩老是湖北黄冈人。家境清贫，读完小学只好考入“吃公费”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一年乡村小学教员。为了力求深造，省吃俭用，从三十二串铜钱的月薪里，全年积蓄了七十多元银洋，千里跋涉去到北京，报考“吃公费”的军医学校，得了个备取第十四名，没补上；随后考取了收费较低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一学期就花去了积蓄的三分之一还多。第二学期读了一半，学校改为大学，学制由两年延为四年，经济开支负担不起，只好中途辍学。

韩老当时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幸好遇上了救星——黄冈老前辈共产党员刘子通老师。刘老师原在湖北高等师范任教，因传播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被军阀督军肖耀南驱逐，刚到北京和吴稚晖、梁漱溟住在一起。刘老师对韩老非常同情，于是介绍韩老去广东，先后在广东财政厅、军政部、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当了一个时期的科员，级职由少尉破格升到少校。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并创建了黄埔军校。韩老毅然放弃了少校科员的职位，考入了第一期。同时入校的陈赓同志和韩老编在第三队的一个班里，朝夕相处。

我问韩老，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建的，学生能否根据

自己的志愿，自由地选择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

韩老摇摇头说，学生都公开履行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却限制共产党公开活动和发展党员，并要求共产党员进行登记。韩老通过陈赓同志的关系，接触了同学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尽管他们的身份没有公开，但韩老观察出，凡是思想进步，言行一致的，几乎多是共产党员。因此，韩老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共产党员同学为表率。以后，还是经过陈赓等同志介绍，秘密履行了入党手续，偿了夙愿。

黄埔建校招生，一旦传出，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纷纷跃起，冲破重重障碍，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奔来广州投考。第一期录取了三百多正取生，编为三个队，但一百多名备取生不能入学。他们大多处于人地生疏，生活无着的境地，要求学校收容，而得到的答覆是：“经费不足，爱莫能助”。最后，三个队各推选代表一人，由入伍生总队长严重（立三）带去谒见大元帅孙中山先生。代表们表示，全体学生愿把自己每天的伙食改为两餐，匀出一餐给备取生吃，请求收进学校。中山先生不但当面嘉许了学生们这种团结友爱、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而且勉励大家说：“命要革，饭也要吃饱，每天三餐不能减。就是减少大元帅府的开支，也要让备取学生全部入学。”代表们莫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回校后向全体同学作了传达，一时“孙中山先生万岁！”的欢呼声雷鸣不绝。韩老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出了孙中山先生爱护青年和伟大的革命精神。

韩老对陈赓同志很尊敬。从一期同学直到毕业后的几年，一直和陈赓同志在一起，因此受到陈赓同志的诱导和影响很深。韩老说，毕业后，他和陈赓同志都分到教导一团五连当排长。东江战役后，韩老才调到三期当区队长、副队长。张治中先生任军宣第一团团长时，韩老和陈赓同志一同到第一团分任四连、七连的连长，到四期毕业时，又同被选送去苏联红军大学进修。约七个

月后，忽接紧急电报“北伐在即，国内需人。”但是当他和陈赓同志辗转回国时，北伐战争已经结束。陈赓同志调任驻汉口的第八军秘书营长，韩老则调任驻武昌的第四军教导营长，仅一江之隔，仍经常见面。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赓同志和韩老由党中央调往上海担任内交通工作，不久，又都调搞工运，负责训练工人。

韩老回忆说，当时，为了利于掩护工作，他和陈赓同志被安排住在上海租界内越界筑路，又叫靶子路的一幢花园公寓里，同住楼下的一个房间，王若飞同志住楼上，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谈工作。在训练工作实弹射击时，买了许多鞭炮，组织附近的孩子们在花园里燃放、嬉闹，以掩盖射击的枪声。有时租界的巡捕寻声而来，往往被蒙哄而去。

说到这里，韩老的神情陡然显得有些激动，他继续说，就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刘少奇同志的。那天，少奇同志隻身来检查布置工作，经若飞同志介绍，少奇同志两手分握着陈赓同志的手和韩老的手说：“同志们辛苦了！”态度非常随和。他们同桌共进午餐后，在坐谈中，外面传来了阵阵轰鸣的鞭炮声，少奇同志侧过头问若飞同志，外面在干什么？若飞同志说明燃放鞭炮的“秘密”后，少奇同志不禁大笑地说，你们干得好！看来，洋人也容易受骗，并不高明，没什么了不起。同时，租界对革命党的工作有好处。韩老说，他当时还不理解这几句话的深意，认为，租界是嵌在中国大地上的耻辱牌，有什么好处？帝国主义者穷凶极恶，怎么能小看？现在回忆起来，自己那时看问题、想事情，还多么肤浅幼稚呵！

韩老沉思片刻，提高声调说，他考黄埔军校是为了反帝、反封建，闹革命，对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的纲领，以及要把中国建成自由、平等、博爱的新中国的理

想，很拥护。而他参加共产党，正是因为黄埔受到许多共产党员的帮助和熏陶，进一步认识到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只有消灭剥削制度，才能达到共产主义，进入人类的大同世界。这个历史任务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

韩老越说越激动，他全神凝聚地说，事实就是铁证，国共两党第一、第二次合作，赢得了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使中国从黑暗步入光明。今天，海峡两岸人为的分裂局面必须结束；亲者痛，仇者快的骨肉隔阂必须消除。这是浩浩荡荡的大势所趋，谁也不能抗拒。

我告辞时，韩老从房内把我送到了楼梯口，还握着我的手说，有时间就来谈谈。多好的老人呵！

当我坐在返回汉口的渡江轮上，激动的心潮伴随着长江波涛，翻腾起伏。一个饱经忧患。临近生命边缘的九十二岁的长者，仍怀着一颗盼统一、盼团结的赤子之心，难道不值得我们崇敬，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让我用韩老一句寓意深远的话作为这篇访问的结束语吧：

“我真诚希望海峡两岸和旅居国外的黄埔军校先后期同学，希望散居各地的故旧、同仁，共同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竭尽炎黄子孙无可推卸的职责；为自己的生命史填上最有价值的一页。”

（一九八四年五月）

广东讲武学校学生一、二队 合并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的经过

刘 梓 馨

一九二三年以前，广东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当时最高的军政领导机构，是孙中山先生亲自担任大元帅的广州大本营。但在实际上，军权并不统一。如控制广州附近地区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形同独立王国，还有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都是各据一方，自成系统。因此，他们为了各自扩充实力，先后创办了为自己培养军事骨干的军官学校，

程潜当时是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趁黄埔军官学校筹建之时，于一九二三年冬，派遣他的湖南醴陵同乡柳甫泉到长沙秘密招生，一些青年以为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军事学校，出于对中山先生的崇拜，大家非常高兴，纷纷投考。我当时刚从湖南私立明德旧制中学毕业，听到这个讯息，毅然约同我的姨老表王梦（解放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和李默庵（解放前曾任湖南绥靖公署副主任），三人结伴到长沙育才中学去报考。录取后，我们三人当即乘坐火车由长沙到汉口转往上海，再搭海船直抵广州。在长沙与我们三人同时录取的同学，还有宋希濂、潘佑强、彭杰如、文志文、袁策夷、胡琪三、陈赓、何章杰、肖赞育等。

我们到达广州后，住在华宁里的旅栈内。这时，已有一批在湖南醴陵考取的同学已经先期到达。他们中有陈明仁、杨润身、周

建陶、苏文钦、李文干等。我们一打听，才知道我们考取的不是黄埔军官学校，而是程潜以军政部名义开办的“讲武学校”。心里感到有些失望，但无可奈何，于一九二四年春入校了。

讲武学校校址在广州北较场，程潜以军政部长兼任这个学校的校长。徒有赣军总司令空名的周贯虹则是这个学校挂名的“监督”。教育长李明灏，以下是：教育副官柳甫泉，第一队队长廖仕翘，区队长林伯渠、惠济、乐钧天；第二队队长章鸿钧；第三队队长程宣；第四队队长余贤立。我被编入第一队第三区队。一、二两队同学约一百五、六十人，都是中学生，醴陵人占大多数；三、四两队同学文化程度就比较低些。

当黄埔军官学校在广州中山大学公开招生时，讲武学校学生中的少数同学，如邓文仪、宋希濂、潘佑强、文志文、陈赓等，悄悄离校前去报考，结果录取，我怕自己难于考取未去。一九二四年八月，讲武学校仅仅开学半年，等三、四两队宣布毕业，多数分配到粤北马坝“攻鄂军”的一、二、三旅中充当排、连长；仍有少数毕业同学无法安插。

这时，一、二两队同学对三、四队毕业同学的安排感到失望；因此更加羡慕黄埔军校，一时议论纷纷。于是二队同学张伯黄（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共产党员）在同学中进行串连，大家商量后，在一个教室里，利用夜间自习的时间，开了一个大会，张伯黄宣布开会宗旨，大意是，我们受训大半年了，三、四队同学毕业了得不到妥当安排，我们毕业后怎么办？看来只有呈请合并到黄埔去……。并且问大家“赞不赞成？大家一致举手表示同意，同时当场推选张伯黄、陈明仁、胡焕文、杨润身、刘梓馨、文起代、胡琪三等十二人为代表，出外分途活动。

当晚，这十二名同学代表秘密逃出讲武学校，住在广州华宁里客栈内，次日一同到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家中，适逢廖先生外出，由廖夫人何香凝接见，表示愿向廖先生转达学生们的

“合并”要求。随后，又由胡焕文、文超代二同学去找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其（湖南益阳人，与胡、文二人同乡），请他代为要求鲍罗廷顾问给予支持。过了一天，我们十二人直接到广州长堤黄埔军校办事处，要求允许我们到黄埔去面见蒋校长；得到同意后，随即乘差轮“南洋号”到达黄埔，由校总值日官钱大钧代表蒋介石接见，陈明仁代表大家说明了我们要求并校的理由，钱大钧当即表示代向蒋校长转达，并命我们回广州听候消息。为了与讲武学校校内同学沟通情况，我们通过一名专门在外担任采购的同学，把我们在外活动的情况一一带给校内同学。随后，校内同学又推选了十二名代表潜出校外，投入“并校”活动。

不久，黄埔军校派教官王俊到广州，将讲武学校一、二队全体学生接去黄埔，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将我们正式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六队。经过大约两个多月的训练，就在我们参加东征的淡水前方宣布毕业，并分别安排到黄埔军校所属的教导一团（团长柯应钦）、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和黄埔三期入伍生总队所属的各连队充当见习官或副排长、排长。我在入伍生总队（当时由王懋功任总队长）当见习官。

讲武学校一、二队同学酝酿与黄埔军校合并期间，兼任校长程潜当时不在广州，正在韶关前方。等到合并完毕以后，他才回到广州；事已至此，他也无可奈何了。

作者解放前曾任国民党陈明仁部少将高参，解放后，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研究员。

从就任湖北省政到川西起义的经过

朱鼎卿

内容简介：原国民党最后一届的湖北省政府和以全部湖北地方团队改编而成的湖北绥靖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湖北全境已经解放之后，又由原国民党国防部授令编为第三兵团，仍由原湖北省主席兼湖北绥靖总司令朱鼎卿任司令，率领所部，由鄂西而川东，川北，最后终于认清了形势，全部在川西起义，投向人民。

为了向湖北人民揭示这段史实真象，这里发表了一组资料，都是这段史实当事者的亲身经历，内容比较具体、朴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朱鼎卿

一九四九年春，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给予蒋介石集团之主力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已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在白崇禧的策划下，我曾一度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嗣后，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逐次改受任务，向西逃窜；最后溃退到成都附近时，眼看大势已去，走途无路，才率部起义，投向人民。现就记忆所及，将这段经历过程，按时间顺序，叙述于下。

一、取得湖北省政的前因后果

我在国民党反动集团二十多年，一贯过着戎马生活，从没有留意地方政治，更没有梦想当什么省政府主席。一九四五年五月间，国民党进行第一期军队整编，由我充当军长的八十六军，被撤裁拨编，我被调充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而实际上，则先后担任“补充兵集训”、“军官总队”和“补给勤务”之类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五月，我调到徐州担任第一补给区司令，归顾祝同指挥。在十三个月的供职期间，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向沂蒙山区进犯，继之苏北、鲁西、豫东会战，补给频繁，各方对我责难甚多。联勤总司令郭忏知道我的苦衷，同时也看到徐州第一补给区已无法控制，不如改用顾祝同的亲信较为适宜。这时，人民解放军跃进到大别山区，白崇禧由“九江指挥所”改为“华中剿总”，在作战上需要配置一个补给机构。郭忏认为在军用物资上对白崇禧的控制很重要，而我又是十八军系统（陈诚系统）中人，比较可靠，且与前方部队长熟识，人事融洽，工作便当。因此，郭忏把我从徐州第一补给区调到汉口任第九补给区司令，第一补给区司令职务交给顾祝同亲信刘永崑接充（刘原是补给区副司令）。我由徐州到汉口，路过南京时，郭忏口头交待说：“你到汉口受白崇禧指挥，除了法令规定的东西外，不要随便接受白崇禧的补给命令。如果他擅作主张，硬要你发东西给张淦兵团，你必须先向南京请示，或就近与战地视察组商量（这时华中战地视察组组长是刘伯龙），否则就会受到处罚，这是总统的意思”。我到了汉口补给区后，郭忏又下达一笔记命令说：“第九补给区归华中剿总战斗序列，执行白总司令的命令，不得贻误战机”。

我从一九四八年七月到次年二月这七个月任职第九补给区司令期间，一方面郭忏指责我不应该乱受白崇禧的补给命令，一方